

《安德森维尔》的历史书写与人文关怀^{*}

王晓丹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26)

提 要: 美国小说家麦金利·坎特在《安德森维尔》中把南北战争期间的战俘交换协议、南北双方的军事策略以及战俘营人事系统的官僚化作为叙述的历史背景, 讲述这些宏观历史背景如何影响被卷入内战的人们的命运, 塑造出南北战争历史语境下人物微妙的人生。文本的审美特征与政治介入体现出作家的社会担当、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 麦金利·坎特 《安德森维尔》; 历史书写; 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4-0122-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4.020

Historical Writing and Humanistic Concern in *Andersonville*

Wang Xiao-da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6, China)

In *Andersonville*, American novelist MacKinlay Kantor has created a variety of characters in American Civil War, and he has woven their lives and fates with the war taking the exchange of prisoners,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the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as the background. The novel has proved Kantor's success in combining aesthetic charm with ideological criticism, which shows the author's social concern,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humanistic sympathy.

Key words: Mackinlay Kantor; *Andersonville*; historical writing; humanistic concern

美国小说家麦金利·坎特(MacKinlay Kantor 1904-1977)集记者、小说家和剧本作家于一身,出版三十多部小说、多篇短篇小说和数部影视剧本。他“主要以长篇小说著名”(虞建华 2015: 626),尤以创作美国南北战争背景下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人所知,其中《安德森维尔》(*Andersonville*, 1955)最为有名,纽约时报书评赞其为“有史以来最好的美国内战小说”。此书于1956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小说类),随后由该小说改编的《安德森维尔审判》被搬上影视屏幕和戏剧舞台。

安德森维尔监狱(官方名称为“桑特营”)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位于乔治亚州的一座关押北方联邦军战俘的监狱。在其存在的14个月里,有近一万三千名战俘死亡(Wagner et al. 2002: 8),大多数人死于坏血病、饥饿、腹泻、暴晒和痢疾。1865年5月,监狱主管亨利·威尔兹上尉被捕并

送往华盛顿的监狱。对他的审判总计进行6个月,军事法庭最终以战争罪判处他绞刑(Futch 1968: 117),这就是著名的安德森维尔审判。坎特是安德森维尔审判事件的诸多关注者之一,他对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等美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这场涉及到司法、历史、政治多个领域的重大事件自然引起他的关注。坎特发挥作家的优势,在参阅大量法律卷宗和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以小说创作的艺术形式回顾一百五十多年前的这场审判个案,塑造出南北战争历史语境下人物微妙的人生和命运,用文本话语对法律案件进行美学再现,构成坎特对19世纪美国历史和法律的复调式思索,引发读者无尽的思考。

1 战俘交换与政治博弈

南北战争期间的战俘交换协议是战俘们最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历史‘非常’事件的小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15AWW005)的阶段性成果。

关注的问题,坎特在《安德森维尔》中多次提及这种关切。例如:威尔兹上尉步行进入战俘营巡视,囚犯们立刻围了上来,不住地询问道:

上尉,威尔兹上尉……

你知道交换的事情吗?

关于交换有什么说法吗?

我们一定会被交换的,是不是,上尉?

他们不可能永远关着我们,对吧?

我们会被交换的,是吧?哦,上尉,求你了!

(Kantor 1993: 174)

战俘们急切的提问让初来乍到的威尔兹迷惑不解,因为进行战俘交换时他正在欧洲,他从未听说过此事,而且“他也没有水晶球,能预测战俘交换何时恢复”(同上)。威尔兹为了避免监狱秩序混乱,安抚囚犯说战俘交换很快会恢复。

坎特对交换话题的数次描写,暗示战俘交换对安德森维尔的重要性。在理想状态下,如果战俘能够不断被交换,南北战争期间战俘营的管理就不会成为棘手之事,但事实并非如此。1862年夏,邦联政府供应林奇堡战俘营的物资能力就已经不足,无法保证战俘的“一切权利”,急需进行战俘交换(Blakey 1990: 47)。1862年7月18日,双方谈判正式签署《1862年迪克斯—黑尔协议》(Dix-Hill Cartel)。

《迪克斯—黑尔协议》签署生效给当时关押在南北多个战俘营成千上万的战俘们带来希望,盼望已久的交换和假释终于得以实现,战俘们数次对“交换”进程的关切反映出交换进程的重要性,但历史上交换进程并不顺利。联邦陆军在南方“没收不忠公民的个人财物和不动产为己所用”(Byrne 1962: 71),引起南方强烈不满。而“南方宁死也不会放弃把捕获的黑奴返还给主人”(同上 103),北方利用战俘交换进程巩固优势战局,以此控制南方军队力量。

由于对是否承认黑人战俘的合法军人身份存在巨大分歧,所以南北双方进行的战俘交换矛盾重重,进程艰难(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2013: 443)。双方代表有大量信件往来,双方唇枪舌战,因为对待黑人士兵不同的观点无法调和,再加上敌对双方难以达成谅解和共识,1863年5月,《迪克斯—黑尔协议》被废除。

协议的废除和战俘交换的停滞最终伤害的是困在数百个战俘营里的几十万南北士兵。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建立之时,正式的战俘交换已经结束,因而导致战俘数量激增。经济困难的南方政府无力维持战俘营庞大的物资开销,战俘交换是唯一

的解决办法,但交换协议的废除让战俘的生存困境进一步恶化(Futch 1962: 15)。《安德森维尔》前几章数次提及战俘们对交换的渴望,但后来战俘们也意识到希望渺茫。小说里坎特描写密苏里骑兵约翰·蓝泽姆的内心从期望到绝望的过程:“珀森斯上校骑马进了战俘营和我们交谈,说再过几周我们就会被交换。他得到了消息,这回交换的事肯定有戏。我们被愚弄够了,不能信他的话”(Kantor 1993: 188)。在安德森维尔营里,战俘们得知官方交换终止的消息,“意志力薄弱的已经彻底死心,意志力最强的还心存侥幸,骨瘦如柴的那些渐渐死去,……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恨格兰特,恨乌尔德,恨那些邦联交换代表们”(同上: 573)。

在坎特笔下,《迪克斯—黑尔协议》的废除不是日期、数字和名字的罗列。他深入到战俘们的内心世界,通过描写协议废除带来的绝望,揭示出协议废除的受害者不是口若悬河的双方谈判代表,而是几十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战俘。诚然,内战期间南北双方对待战俘的方式是建立在《奥本海国际法》框架下的理性方式。但是,在坎特看来协议废除带来巨大的灾难,战俘交换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不是现代文明的注脚,而是战俘们承担意识形态对峙的后果。南北双方交换谈判的过程其实是美国假释制度的一个发展阶段。在内战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俘奴隶的物品属性和黑人战俘的权利存在巨大争议,实则是双方对奴隶制去留的深刻社会矛盾。战俘交换被用作控制战场的战略工具,是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政治势力的博弈和意识形态抗衡的结果,是南北政府各自利益诉求的外在表现。

2 生存挣扎与军事抗衡

坎特在小说里对《迪克斯—黑尔协议》这段历史的再现,巧妙地揭示出意识形态对战俘交换进程以及战俘生存的影响。为强化揭示的效果,坎特还呈现北方联邦军“向海洋进军”、火烧亚特兰大、南方铁路中断等历史事件,借用人物之口分析上述事件对南方经济的摧毁。坎特在小说里给主要叙事人之一克莱菲设计前往里士满为战俘请愿的情节,用克莱菲的视角再现火烧亚特兰大、铁路中断的历史事件。南方种植园主埃尔瓦·克莱菲(Ira Claffey)准备出发时,“大火已经在亚特兰大蔓延,有传言说谢尔曼准备进攻奥古斯塔。整个西南部的铁路线已经被联邦军控制,乘火车必须要获得通行证”。费劲周折拿到通行证后,埃

尔瓦来到火车站。“安德森火车站北部有很多晚点滞留的火车,他要乘坐的火车也不例外,埃尔瓦坐在一辆四处漏风的破马车里等着火车被修好。火车头组的工人现在还得干轨道组的活,……黑暗中头盔上的灯不好使,灯泡早就烧坏了。处理火车故障这样的紧急事件,只能用一辆老式的手推车,但手推车载满了一堆松枝,只能先把松枝卸下来,再把平板车挂在车头前面。蒸汽发动机烧的发红,痛苦地以驴车的速度前进”(同上:607)。前往里士满的路上,坎特借用埃尔瓦的视角描绘战争期间的难民群像。到处是“衣不遮体的流浪者,眼里露出警惕怀疑的目光。他们脸颊消瘦,面色枯黄,满目憎恶,……一个婴儿被包裹在一堆分不清颜色的肮脏破布里,如同野猫一样,几乎难以辨认婴儿的性别”。难民们的悲惨形象在埃尔瓦看来“是远处血腥战场活生生的证据”(同上:609)。小说里安德森火车站的破败景象是内战后期被摧毁的南方铁路系统的生动反映,衣衫褴褛的难民反映出战火中饱受折磨的人们的状态,满目疮痍的亚特兰大是烧杀抢掠般“向海洋进军”行动的后果。摧毁铁路、进军亚特兰大的背后是联邦政府在格兰特指挥下采取的军事策略,代表着国家意志。

为尽快摧毁南方,格兰特允许谢尔曼的部队在进军时,如果当地军民有焚烧桥梁、堵塞道路等敌对行动,谢尔曼可以依据敌对程度,发令进行破坏和报复:“竭尽所能深入敌境内部,把他们的战争资源进行一切破坏……毁掉一切可以用来支援或者供养军队的东西……把他们毁掉,不必流血,能达到与消灭敌军同样的效果”(韦格利 1986: 179)。谢尔曼带领部队一路南下,捣毁亚特兰大全部铁路及工厂车站,放火烧城,掠夺财产。1864年秋近一个月内,谢尔曼的部队破坏约三百英里的铁路,切断几乎所有南方军队食品和药品的供给运输线。

谢尔曼执行的格兰特的军事策略或许是北方军事史上光彩的一笔,但在坎特的小说里,这些军事行动不是军事战术运用成功的范例,而是安德森维尔战俘营食物匮乏、工具短缺、药品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向海洋进军”的确实实现了“不必流血达到与消灭敌军同样的效果”,但死去的是成千上万的联邦士兵。当我们把《安德森维尔》置入内战时期的政治氛围里解读,考量事件背后的政治意志和军事抗衡,不难看出坎特以独特的方式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他的批判不局限于北方当局的军事命令和战术策略。《安德森维尔》的叙述脉络交织着战俘

营内部管理层的矛盾,坎特把批判之笔指向南方,揭露在物资奇缺的状况下,约翰·温德将军“任人唯亲”(Kantor 1993: 153),腐败滋生,官僚作风甚上,战俘生存困境雪上加霜。战俘们没有足够的蔽身之地,只能“暴露在严寒、冰雪、雨水、极度炎热和特殊气温变化”等恶劣天气环境下,“感染疾病的概率飙升,”“冻疮和中暑是冬夏两季常见的疾病,很多军医认为疟疾之所以成为战俘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蔽身之处。帐篷过于简陋,不能应付极端天气”(Wagner et al. 2002: 640 - 641)。在《安德森维尔》中,营房不足,帐篷简陋,更常见的是帐篷奇缺的状况。小说披露战俘营在建设之初就遇到材料不足的困难,“不是盖房子缺一点稻草,而是连砖都没有”(Kantor 1993: 215)。威尔兹写信请求军需和帐篷,汇报战俘营内“囚犯无遮盖之物,战俘营医院里病人太多,”而且“严重缺乏工具、材料和人手,”“监狱如此拥挤,患病率和死亡率将会在夏天迅速上升”(同上: 218),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军中的腐败让牢房修建更加困难。珀森斯中校在任期间,数次申请木材原料,但木材价格奇高,一直没有获得批准。“终于等来了51车木材,正好约翰·温德将军及其随行从火车上下来,视察安德森维尔。”(同上: 341)坎特评价道:“安德森维尔失去了一位充满善意的长官(珀森斯),被一位充满恶意的人代替。……远处山坡上正在搭建40、50座房子,当然不是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里。木材当然不能用到囚犯身上,那是给温德尔将军盖的办公室和营房。迪克·温德,斯迪·温德!不能让任何温德家族的人知道用木材建囚犯营房的事!”(同上: 343)珍贵的木料没有当作搭建牢房的原料,温德将军认为,“囚犯们是北方佬,理应被如此对待”(同上: 396)。目前保存的内战期间的档案,也记录“官僚主义式的争论让情况更糟”的事实(Bearss 1970: 66)。

如果把《安德森维尔》文本与官方保存的记录作对比,很容易发现温德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是冷酷无情,对北方佬恨之入骨的恶魔;后者是尽职尽责,却对官僚之风无能为力的将军。温德形象的差异再次印证文本历史性的叙述张力,两种文本的并置赋予小说话语能力,打破官方话语的唯一权威。此外,坎特描写的战俘营中的官僚主义与官方文献的记载异曲同工,库伯、温德、诺斯罗普等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在不同的文本媒介里被复活,一个明确的信息得以传递:官僚主义、责任推诿、在职不作为的情况在安德森维尔管理

体系并非个案。坎特在小说里对军需物资管理混乱和邦联军队高层之间矛盾的描写,与战俘营饿殍遍野的凄惨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坎特还把这种反差编织成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奈特副官巴结温德将军,妄想获得升职,节衣缩食准备火腿大餐宴请温德将军。一阵狼吞虎咽之后,满嘴流油的温德将军在回途突发心梗而死(Kantor 1993: 672),这是整部小说里唯一一处饱餐的场景。饱餐与饥饿,邦联军官与北方战俘,生存与死亡等强烈对比跃然纸上。对比技法的运用不仅是作者“昭示生命的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努力(钱中丽 2018: 121),更是构建文本意义生成的活力:庞大的管理体系中官僚腐败是战俘命运蝴蝶效应的促发者,坎特借用巧妙的写作技法,传递他对困于本能需求的战俘的同情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3 历史书写与人文关怀

坎特在小说的扉页引用邦联军队外科医生兰多夫·斯蒂文森的一段话开篇:“未来任何历史学家要想不带偏见地讲述南北战争的故事,都要在公正的标准下将一切因素考虑在内。不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难以逃脱历史”(同上: Preface)。坎特努力“不带偏见地讲述”这段历史,正如普利策奖对他的评价“他以历史小说对美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部一出版就卖出22万册的小说,体现出作者精湛的文字功力。坎特有“卓越的洞察力,能够在全知视角和人物内心之间自由穿梭。视角的流动性使读者能够窥见人物如何陷于罗网无法挣脱”(Haverlin 1955: 431)。他用丰富和带有强烈感官特色的词汇,融合人物意识流和现实时间的脉络,以印象主义的画笔,色彩浓郁地绘制出挣扎在饥饿、寒冷、伤痛、炎热中的战俘肖像群。

坎特善于运用复调式的叙述结构,架构起战俘营内外、想象与现实、内心情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安德森维尔》有两条叙述线索:一是每章由一个全知视角第三人称叙事人讲述监狱里战俘们的经历和内心感受;二是乔治亚州安德森维尔镇种植园主克莱菲一家的生活。两条线索按照时间顺序各自独立,时而交叉。

小说叙述的第一条线索围绕战俘们的饥饿感和监狱里的恶劣环境展开。坎特大量使用描写味道和颜色的词汇,形象地再现安德森维尔臭气熏天、令人作呕的生存空间。安德森维尔里唯一的饮用水水源是一条“穿过战俘营的小河”,河面“塞满了倒地的树枝和灌木丛,河水断续地从东

部穿过,几乎被随意倾倒的垃圾阻断”。面包房建成后这里又成了排污口,“倾泻的排泄物混在一起,把河流变成一片沼泽,成为春季苍蝇疯狂交配之地”(Kantor 1993: 154)。到了夏天,“沼泽的颜色有了变化,不仅是粪便和糊状渣滓,而且是一片黄棕色的残渣堆,形如海绵样的腐烂物,表面被日晒风干成硬壳状”(同上: 251)。囚犯威利·曼恩(Willie Mann)看到“颜色暗黑如同墨水般的河流”,简直就是“腐烂物沤成的油”,认为“把黄色物的液体叫做水是最邪恶的谎言”(同上: 447),他决定不喝水,只在下雨的时候喝雨水解渴。

饥饿如同恶魔,困扰每一位战俘。经常有人“到死人的遗物堆里找剩下的玉米饼”。鸟群飞过安德森维尔上空,一名战俘“抄起支撑窝棚的树棍朝天空绕圈挥舞,打落一只燕子,好多只海盗般的贼手伸向猎物,他猛地冲了上去,扑到燕子身上,搂在怀里。他边站起身边拧断了它的脖子,用力吸吮,吐出嘴里的羽毛”(同上: 257)。过度的饥饿让战俘们时常出现幻觉,“安德鲁·凯尔克喜欢详细地描述父亲的餐桌,描述带来的满足感让他撑过挨饿最初的时光”(同上: 81)。伊本想吃肉,“他列数自己知道的肉的种类,有时候半夜醒来会突然想起一个新种类,连忙加到清单里”(同上: 252)。饥饿和营养不良使很多战俘患上坏血病,牙齿严重脱落,四肢无力。为逃离可怕的监狱,有人装死藏在拉运死尸的推车里越狱。在坎特的文本世界里,战俘的经历不是档案里一串串冰冷的数字,他赋予每一个人物独有的名字,每个独立个体的经历和内心感受都分外鲜活。

与战俘们的苦难相呼应的第二条叙述线索是安德森维尔镇种植园主克莱菲一家的生活。克莱菲一家住在战俘营不远处,开工建设之初他家的黑奴和工具被征用。克莱菲经常充满同情地观察监狱里的一切,因此克莱菲一家是南北战争的历史亲历者,是安德森维尔事件的见证者,更是卷入南北战争的几百万人中的一个缩影。克莱菲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内战爆发后,3个儿子先后死在战场上。妻子维罗妮卡无法承受接二连三的丧子之痛,深陷臆想中,恐惧现实。精神失常的她把3个儿子的旧物摆放成他们儿时的样子,每日对着空气,与想象中还是活着的孩子们交谈。最后维罗妮卡精神完全崩溃,不幸溺水身亡。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内,战俘们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战俘营外,克莱菲一家饱经亲人战死疆场、精神失常、意外身亡、南方经济没落等种种不幸。埃尔瓦成为战俘营内外的“中介”,两个空间的苦难是他

心理创伤之源。坎特“通过文学性地书写”这段特殊的历史来体现自己对生死挣扎、精神困境等“严肃问题的思考与态度”(王明睿 2017: 126)。

小说的叙述犹如一首悲伤的复调曲,战俘营内外都是内战中人们的惨痛遭遇;每个人物的内心活动与外部世界构成一组复合结构,叙述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意识的流动连结过去、现在与将来,勾勒出南北战争这段历史里人们的生存挣扎。坎特在小说中把焦距对准关押在战俘营里的小人物,同时也对准南部乔治亚州的普通人,捕捉和放大他们的求生困境,表现他们在恶劣生存环境中的心理状态和极端行为。“饥饿”是坎特创作复调曲的主旋律,是战俘营内外两个世界、二重叙事脉络的连接点。安德森维尔小镇周围的人们身处绝境、如临深渊,他们在绝望和恐惧中挣扎,随时可能被死亡吞噬。

4 结束语

《安德森维尔》的结构并不复杂,每一章聚焦一个人物,有大量的细节和心理描述。但坎特没有止步于个性化的事件陈述和历史再现,他运用铺陈式的结构和情节布局,把南北战争期间的战俘交换协议、南北双方的军事策略以及战俘营人事系统的官僚化作为叙述的历史背景,讲述这些宏观历史背景如何影响卷入内战的人们的命运,从而达到隐性的政治介入,因而小说具备一定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是坎特结合文本的审美特征与政治介入的努力,体现出作者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安德森维尔》是一部关于“囚禁”的小说,是超越战俘营里的“囚禁”的广义上的囚禁。坎特早期战争小说里的一些观点在这部小说里趋于成熟“困于战火洗礼和困于生存挣扎中的人们一样,除非跨越人文精神之门,别无出路”(Haverlin 1955: 432)。在小说的结尾处,克莱菲的女儿露西从未婚夫阵亡的悲伤阴影里走出,与同样经历失去亲人痛苦的埃尔金斯(Elkins)结婚。露西结婚、怀孕的情节象征着战争造成的创伤在慢慢愈合,新的希望与新的生命一同孕育。这样的尾声情节并非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设置的皆大欢喜式结局,坎特一方面以这样的结局暗指南北战争结束后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期;另一方

面重生和希望的隐喻寄托坎特对众多死亡生灵的哀悼:唯有换来重生和希望,战争中的死亡才有价值,同时表达坎特对人性美好的期待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拉塞尔·韦格利. 美国军事战略政策史[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 钱中丽. 时与赎: 福克纳作品中时间的意义[J]. 外语学刊, 2018(2).
- 王明睿. 浅析帕斯卡·基尼亚尔的历史书写[J]. 外语学刊, 2017(1).
- 虞建华. 美国文学大辞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Bearss, E. *Andersonville National Historical Site: Historic Resource Study and Historical Base Map* [M]. Washington: Offic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 Architecture Eastern Service Centre, 1970.
- Blakey, A. F. *General John. H. Winder* [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90.
- Futch, O. *Prison Life at Andersonville* [A]. In: Hesseltine, W. B. (Ed.), *Civil War Prisons: A Study in War Psychology* [C].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Futch, O. *History of Andersonville Prison* [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68.
- Haverlin, C. *Andersonville* (Review) [OL]. <https://muse.jhu.edu/article/416539/summary>, 1955.
- Byrne, F. L. *A General Behind Bars: Neal Dow in Libby Prison* [A]. In: Hesseltine, W. B. (Ed.), *Civil War Prisons: A Study in War Psychology* [C].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Kantor, M. *Andersonville*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 A Compilation of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Armies* [Z]. Miami: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3.
- Wagner, M., Gallagher, G., Finkelman, P.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ivil War Desk Reference* [M].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ress, 2002.

定稿日期: 2018-05-30

【责任编辑 陈庆斌】